



丁玲

# 我的生平与创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2 039 7123 8

丁玲近作（二）

# 我的生平与创作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成都



责任编辑：徐 靖

封面设计：戴 卫

**我的生平与创作**

丁 玲

---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7.625 插页5 字数131千

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200册

---

书号：10118·660

定价：0.66 元



作者近照

60.7.9.6

## 出 版 说 明

收在书中的二十多篇文章，是丁玲近一年的新作。作家以抒情的笔调，炙热的语言，讲述着她怎样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迈步前进，叙述了她在创作上的甘苦，表现了自己一贯的文学主张。有理有情，真实，生动。

# 目 录

我的生平与创作·····	1
我怎样跟文学结下了“缘分”·····	11
我的命运是跟党联在一起的·····	21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	26
毛主席给我们的一封信·····	53
附：毛泽东同志给丁玲、欧阳山的信·····	57
我与戏剧·····	58
《牛棚小品》刊出的故事·····	68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俄译本前言·····	73
《丁玲短篇小说选》意大利文版序·····	77
五代同堂 振兴中华·····	79
答《当代文学》问·····	92
如何能获得创作的自由！·····	99
到群众中去！·····	108

增强党性 去掉邪气.....	114
谈写作.....	122
还是要人、文并进.....	147
关于杂文.....	152
延边之行谈创作.....	158
《叶圣陶论创作》序.....	172
与艾思奇同志相处的日子.....	182
为《杜烽戏剧集》序.....	187
为李又然同志的散文集写几句话.....	192
我读《洗礼》.....	195
漫谈《牧马人》.....	206
歌德之歌.....	216

## 我的生平与创作

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一日，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中心举行中国周末的活动，这是我在这个活动中的一次发言。

上个月我在国际写作中心举办的中国文学报告会上，讲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情况，很多朋友希望我再讲一点自己的生平与创作。我看到国际写作中心关于中国周末活动的日程表上，也是这样—个题目。我现在便就这个题目，概略地讲—点。

我是一个中国作家，是中国人民的女儿。中国人民的艰难生活哺养着我，教导着我，使我—生都跟着人民的足迹生活、工作、写作，六十多年来，可以说是见过—点世面，经过—点风雨。现在我已七十七岁，我只存—点希望：为人民继续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出生在二十世纪初，一九〇四年，满清的末年。我的家庭是世代为官的豪门望族。这个家庭里充满了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各种人物，实际上是整个没落的封建社会的缩影，充满了惊心动魄的矛盾故事。这个大家族中的一部分逐渐没落垮台，贫穷潦倒。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把家产耗尽时，死了。那时我不满四岁，我成了一个贫穷的孤女。寂寞的童年，帮助我深刻领会二十世纪初封建社会里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世态炎凉。因此，那时我爱读中国的古典小说，觉得那里面反映了我所处的社会时代，我可以从那里得到安慰，得到启示。同时，我也爱读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十九世纪的世界文学，这些，孕育了我后来从事文学写作的最初的胚芽。更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明智的母亲。我父亲死后，她从封建的家庭牢笼里跳了出来，闯进社会，自食其力，从事教育工作。她不只是接受了当时西欧的民主思想，还进而对社会主义革命也抱着朦胧的希望。她经常给我讲一些古今中外慷慨悲歌忠勇壮烈的故事。因为有了这些最初的影响，我能够抛开那堆集在我幼小心灵里的忧郁感伤。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来临的时候，我十四岁，我们母女都投入到这个浪潮里。这次运动给了我最大的启发，把我从狭小的天地，以为读书只是为了个人的成就，可以独立生活，可以避免寄人篱下，可以重振家声出人头地的

浅陋的思想境界，提高到应以天下为己任，要出人民于水火，济国家于贫困，要为中华祖国挣脱几千年来的封建枷锁和摆脱百年来殖民地的地位。于是我走长沙，闯上海，进了共产党最早创办的第一所平民女校，认识了一些著名的革命人士，接受他们的教导和影响，也参加过一些群众斗争。那时候，中国共产党还是幼年时期，正在探索、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和道路。当时由于我自己有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希望在极端自由的天际中飞翔，鹏程万里，在黑暗时代的现实社会，我必然碰壁，必然陷入愁苦的深渊。因此我感到寂寞、苦闷，我要倾诉，我要呐喊，我没有别的方法，我拿起了笔，抒写我对旧中国封建社会的愤懑与反抗。因此，我很自然地追随我的前辈如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人，和他们一样，不是为了描花绣朵，精心细刻，为艺术而艺术，或者只是为了自己的爱好才从事文学事业的，不是的。我是为人生，为民族的解放，为国家的独立，为人民的民主，为社会的进步而从事文学写作的。许多与我同时代的作家以及后来的年青的一代也都是由于这同一要求而进入文学行列。这自然不是说，在我国为艺术而艺术的人一个也没有。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不能不使我进一步思考，中国的出路在那里？人民的出路在那里？我很自然地站在人民一边，我的思想日

益左倾。尽管这时我已经在文坛上稍露头角，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我可以借着这点名气，亲近几个绅士名流，找到一个收入不坏的职业，个人从此慢慢向上爬，爬到上层社会去。我的朋友中，就有这样的人。但这是违背我自己的意愿的，我鄙弃这种个人的虚荣和名利思想，坚决走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路。三十年代，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的时候，我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左翼作家联盟，随后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要沉入，深深地沉入，沉到人民中去，和人民共忧患，同命运，共沉浮，同存亡。反映在我的作品中，就从二十年代末期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女性向封建社会的抗议、控诉，逐渐发展、转变成为了农民工人的抗争。我选择的这条道路，为当时的统治者国民党反动派所不容。那个时代，以文取罪者比比皆是。五十年前，恰恰五十年前，我的丈夫胡也频以及柔石等左翼作家联盟的五个盟员以及其他十几个革命者同时被惨杀于上海警备司令部的龙华监狱中。朋友们一定会惊诧，怎能不经过任何法律手续就在黑夜用机枪扫射，杀害作家、青年。实际那时只要有一本红色封面的书，就可以成为被捕杀的口实。作家们在刑场上、监狱中和其他革命烈士一样慷慨牺牲，从容就义。这些正说明中国新文学的一个大特点。中国新文学的生长发展是同政治密不可分的，新文学的花朵是染着烈士们的鲜

血的。

一九三三年五月，我自己也被秘密绑架囚禁。只是由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等著名人士组成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呼吁援救，以及国际知名人士巴比塞、古久里、罗曼罗兰等的抗议声援，我得以不死。但我的作品，我的书全部被禁止发行，而诬蔑我的政治谣言和人身攻击的流言却在报刊上到处传播。三年多之后，由于鲁迅和党的帮助，我逃离南京，进入陕北革命根据地，我才回到人民中来。

抗日战争时期，我随八路军到前方战地作宣传工作，在抗日首府延安作文艺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我参加摧毁封建土地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新中国成立后，我参加文学事业的领导和组织工作。当我做这些工作时，我常常忘了自己是一个作家。我沉醉在工作中，以为当一名宣传员，当一个农村的党支部书记也很满足，也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为人民服务。只有当我离开这些实际工作后，我才感到缠绕在我灵魂深处的是那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以及那些令人振奋和激动的场景，我不能自己要把这些记录下来，于是我写小说，写散文，写杂论。

我写作的时候，从来不考虑形式的框框，也不想拿什么主义来绳规自己，也不顾虑文章的后果是受到欢迎或招来物议。我认为这都是写作完了之后，发表之后，由

别人去说去作，我只是任思绪的奔放而信笔之所之，我只要求保持我最初的、原有的心灵上的触动和不歪曲生活中我所爱恋与欣赏的人物就行了。

我知道，很多朋友，很多同行，对我几十年的经历感到关注、同情。也有人因此慨叹中国革命者生活的坎坷，关心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这都是很自然的，我能理解。为此我向朋友们、同行们表示衷心感谢。

远在一九五五年，我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一九五七年又被错划为右派，我在全国的报纸杂志上受到不断的公开的指责。这样，几乎有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时间使我失去了写作权力，但也使我经历了许多人世沧桑，学到了许多在书本中学不到的社会人生，锤炼我一颗为人民的红心。一九七六年以来，特别是一九七八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揭露了“四人帮”反党罪行，认真检查了极左路线的错误，大力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由于新的党中央的指导、督促，这一重大错案，在二十二年之后，终于得到改正，事实恢复了本来的面目，所谓“反党集团”并不存在，划我为右派也是错误。如今，历史展开了新的一页，我本人恢复了党籍，恢复了工资，恢复了写作；我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在作协单位里，因为我而受到牵连被划为右派的同志，也百分之百的得到了改正，他们现在都在重要的文

艺岗位上继续写作、工作。为这一错案而多少担负一些责任的同志也总结教训，并且在一九七九年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公开道歉。现在我们大家都在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文艺创作的新的繁荣而工作。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之后，我鼓起最大的勇气，把头帽子上的帽子，把必然要遇到的障碍，统统置于脑后，我带着党和人民历来对我的教导和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热烈追求，我和我的老伴陈明到黑龙江的北大荒去开辟新的道路，在那里我参加劳动，当文化教员，作家属工作，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我去北大荒，并不是组织上给我的处分。我被批判后，我自己认为我不能留在北京关门写作，不能离开群众远离人民生活。组织上批判我，处分我，撤消工作，不给工资，我都可以承担，但是开除党籍，这意味着我与人民的隔离，鱼怎能离开水，这是我绝对不能忍受的。但是我只有拿勇气和毅力去逐渐改变这种处境。于是我要求到人民的最底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和劳动人民一起，取得他们的了解与谅解，于是我要求到北大荒去，这是不可能被拒绝的。

八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的经历，大大帮助了我在北大荒的生活，使我能承受新的严峻的考验。劳动一年后，我当生产队的文化教员。我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赞扬和基层组织的认可，我所在的农场群众与领导几

次写报告，要求摘掉我的右派帽子，推倒隔离我和革命之间的这堵高墙。这几年里，我重新认识生活，结交了很多朋友。人民群众的热情和他们对我的新的了解和信任，是得来不易的，这是医治我心灵上隐痛的良药，我永远牢记他们。正当中央农垦部和农场党委答应给我写作条件，我准备重新提笔的时候，一场“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对于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我们党已经作了历史的、全面的总结：“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不言而喻，我这个“死老虎”这时又被他们看上了。在这场空前的浩劫里，党的政策被破坏，党的传统被抛弃，党和国家的干部、人民群众备受蹂躏，我个人也受尽折磨。尽管随时随地都有好心的群众在困难中给我以帮助，用一些办法保护我，我永远感谢他们，怀念他们，但这只能使我在精神上得到安慰，鼓舞，而并不能脱我于灾难。直到一九七〇年四月，“四人帮”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名义来逮捕我，给我带手铐时，我的第一个思想便是：“救命的来了”。这样就结束了我在风雪严寒的北大荒十二年的生活，而开始了五年的铁窗生涯。

监狱的生活是比较平静的，每天可以看《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林彪垮台以后，狱中的伙食明显改善了，每天放风，可以借书看。我在这时通读了马恩

全集和重读了鲁迅的许多书。这些书给我很大安慰。我在监狱里坚持锻炼身体，打太极拳，做广播操，跑步。为防止长期不讲话，语言能力可能衰退，我小声背诵诗句，或唱歌。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复出，一度主持中央工作时，狱里的许多人释放了，我和陈明也在这时得到释放。

一九七五年我被安排到山西长治，和陈明一起。五年以来，我无从得知他的下落；两个人劫后重逢，自然是高兴的。这时，我们和儿女恢复通讯。一九七九年初，经过党中央的批准，我们回到北京。这年春节，我们一家八口，合拍了一张全家福照片，一九八〇年十月的《人民画报》曾经登载。《人民画报》有十余种外文版，许多外国朋友和不相识的人看过画报，都为我高兴，有的写信给我，向我祝贺。我应向他们表示感谢。

两年多来，我的书已经恢复出版。旧作出版发行的有六本，新作也出版了两本。

现在，我搜索自己的感情，实在想不出更多的抱怨。我个人是遭受了一点损失，但是党和人民、国家受到的损失更大。我遭受不幸的时候，党和人民也同受蹂躏。许多功劳比我大得多的革命元勋、建国功臣所受的折磨比我更大更深。一个革命者、一个革命作家，在革命的长途上，怎能希求自己一帆风顺，不受一点挫折呢？



现在我的国家正处在大乱之后，疮夷满目，百废待兴，举步维艰。此情此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古代的多少爱国诗人，他们曾长歌代哭，抑郁终生。但我决不能沉缅于昨天的痛苦而呻吟叹息，也不能为抒发过去的忧怨而对现今多所挑剔，我更不愿随和那种少数虽有好心，但忽视全局，轻易作出的片面的论断。这些对于国家的安定团结，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建设，都不会有实际的补益。我坚决相信，只有十亿人民，同心同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总结经验，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埋头实干，勤奋学习，我们的国家才能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伟大贡献，而我国的文学也必将带着我国民族的特色，丰富世界文学艺术的宝藏。

谢谢诸位。